

四川大学博物馆 中国古代铜鼓研究学会 编

第三辑

1990 南方民族考古

SOUTHERN ETHNOLOGY AND ARCHAEOLOGY

VOLUME 3

中国
四川
成都



**本辑由格蒂基金会资助出版
特 此 鸣 谢**

This issue is published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he Getty Grant Program

目 录

- 论印度尼西亚的金属时代卡塞琳·林道夫 (1)
- 班清与泰国东北部青铜文化的编年问题乔伊斯·C·怀特 (15)
- 岭南铜鼓图象、纹饰剖析杨 豪 (23)
- 铜鼓与丧葬礼仪蒋廷瑜 (53)
- 商周青铜器的动物造型和纹样与古代图腾崇拜熊传新 (63)
- 广汉三星堆一号、二号祭祀坑几个问题的探讨宋治民 (69)
- 浅释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边璋”图案陈德安 (85)
- 道教五岳真形图和有关两种古代铜镜材料的研究——道教考古专题研究之二
.....张勋燎 (91)
- 汉魏晋时期蛮夷印章的使用方法——以西南夷印章为主进行的考察棍山胜 (113)
- 云南青铜文化的陶器及其与越南东山、泰国班清文化陶器的关系王大道 (131)
- 四川省青川战国墓的研究间淑收芳 (149)
- 汉、唐间蜀境之民族迁徙与户口升降蒙文通 (163)
- 论藏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李绍明 (175)
- 关于近年来早期农业的研究森本和男 (189)
- 论大溪文化徐祖祥 (213)
- 百色旧石器与南亚、东南亚早期旧石器的关系谢光茂 (237)
- 洞庭湖区澧水流域发现的旧石器向安强 (249)
- 藏南吉隆崖葬习俗的调查与初步研究霍巍 李永宪 (271)
- 广西隆林龙洞发现的人类化石及其共生的哺乳动物群彭书琳 王文魁 (287)

雅安沙溪遗址发掘及调查报告……………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雅安地区文物管理所 (293)

四川邛崃县固驿瓦窑山古瓷窑遗址发掘简报……………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邛崃县文物管理所 (341)

成都罗城1、2号门址发掘简报 ……………成都市博物馆考古队 (369)

SOUTHERN ETHNOLOGY AND ARCHAEOLOGY

volume. III, 1990

CONTENTS

- Discussions on the Indonesian Metal Period*Katheryn M. Linduff* (1)
Ban Chiang and the Problem of Chronology for the Bronze Culture
of Northeast Thailand *Joyce C. White* (15)
A Research on the Decorative Motifs of the Bronze Drum in
Ningnan*Yang Hao* (23)
Bronze Drums and Funeral Practice*Jiang Tingyu* (53)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Animal Models and Motifs of the
Shang-Zhou Bronze Culture and Early Totemism
..... *Xiong Chuanxing* (63)
Some Thoughts on the Ritual Pits NO. I and NO. II of the
Sangxidui Site in Guanghai *Song Zhimin* (69)
An Explantation for the Design on the Bingzhan Unearthed from
Pit NO. II at Sangxidui *Chen Dean* (85)
A Study of the Taoist Miniature for the Five Mountains and the
Related Bronze Mirrors *Zhang Xunliao* (91)
The Usage of "Manyi" Seals during Han, Wei and Jin Periods
— A Study on the Seals of "Xinan Yi" (Southwest China
Nationalities) *Kachi Kaziyama* (113)
Pottery of Bronze Culture in Yunan, China and Its Relations
with the Dong-S' on and Ban Chiang Cultures*Wang Dadao* (131)
Tombs of Warrior States Period in Haojiaping 郝家坪, Qingchuan
County 青川县, Sichuan Province *Kazuyoshi Mase* (149)
Change of Population Related with the Migration of Minor
Nationalities in Sichuan during the Han and Tang Period
..... *Mong Wentong* (163)
On the Tibetan Integration with Multi-Elements *Li Shaoming* (175)
Study in Recent Years on the Early Agriculture*wadan Morimoto* (189)

- An Archaeological Approach to the Daixi Culture*Xu Zuxiang* (213)
- Relation between the Stone tools from Baise and the Lower
Palaeolithic Cultures from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 *Xie Guangmao* (237)
- Palaeolith Discovered on the Lishui Basin, the Dongtinghu Lake
Region *Xiang Anqiang* (249)
- Investigation on the Cliff-Burial Custom in Jilong County, Southern
Tibet*He Wei, Li Yongxian* (271)
- Fossils of Human Being and Mammal Discovered in the Longdong
Cave at Longlin County, Guangxi *Peng Shulin, Wan Wenkui* (287)
- The Excavation at the Shaxi Site in Yaan.....
.....*Sichuan Cultural Relic Management Committee, Insititue of
Antiquities and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of Sichuan, The Cultural Relic
Centre of Yaan* (293)
- Excavation of Ancient Porcelain-Producing kiln at Guyi, Qionglai
County, Sichuan.....*Sichuan Cultural Relic Management
Commitee, Insititue of Antiquities and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of
Sichuan, The Cultural Relic Centre of Qiong Lai* (341)
- Excavating the Site of Ancient Chengdu City Gate; A Brief
Report *Chengdu Museum* (369)

论印度尼西亚的金属时代

卡塞琳·林道夫

(美国匹兹堡大学艺术系)

具有东山文化类型和纹饰特征的铜鼓或铜鼓碎片早自1730年便在印度尼西亚有所报道 (Barchewitz, 1730)。随着本世纪三十年代东山地区本身进行的考古活动和有关报告,西方学者报道了更多印度尼西亚铜鼓的资料,开始是海涅·革尔登(1933, 1937),还有戈罗伯(1932)、胡普(1932)和劳文斯登(1956)。他们所提到的器物主要是黑格尔 I 型铜鼓,即在形制和纹饰上模仿越南出土的典型器物,这类铜鼓现在已在整个东南亚发现,当然也包括中国南部和西南部地区(见附录 I)。由于对它们报道引证得最早,这些铜鼓被认为标志着印度尼西亚金属时代的发展。

以前的学者根据这一证据把印度尼西亚与东山文化丛相联系,相信一旦建立起形制、风格和纹饰的分类,传播的模型就有迹可寻。于是便能用这些模型去探明交流的方式与方向 (Coedes, 1962; Goloubew, 1929, 1932),并能最终揭示出其可能的用途和其纹饰图案的意义。学者们过去认为,只要一种文化优于另一种文化,其影响就会从主导中心地区向后辐射 (Chang, 1964; Bleckman, 1972)。高本汉主张中国起源说 (Karlgren, 1942); 传播论学者如海涅·革尔登却首倡另一观点,即这种艺术反映出它的西方起源,东山则是它环太平洋进行民族性移徙的起点,该移动可能解释太平洋盆谷地区所发现的类似器物 (Heine-Geldern, 1928, 1932, 1937)。例如,196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便将注意力集中在中国对太平洋地区文化的贡献上 (Barnard, 1974)。

更新的研究受益于大量新获得的考古学资料,也得助于诸如碳14测定这样的新技术及有关考古调查的新概念。例如,1965至1968年在泰国中部的依诺它遗址和1986年在中国四川广汉遗址均发现青铜器的使用,两处年代都可早到公元前二千年纪,这便重新提出在整个东南亚和东亚地区金属器使用和制造的起源问题 (Solheim, 1980)。重新考虑公元前一千年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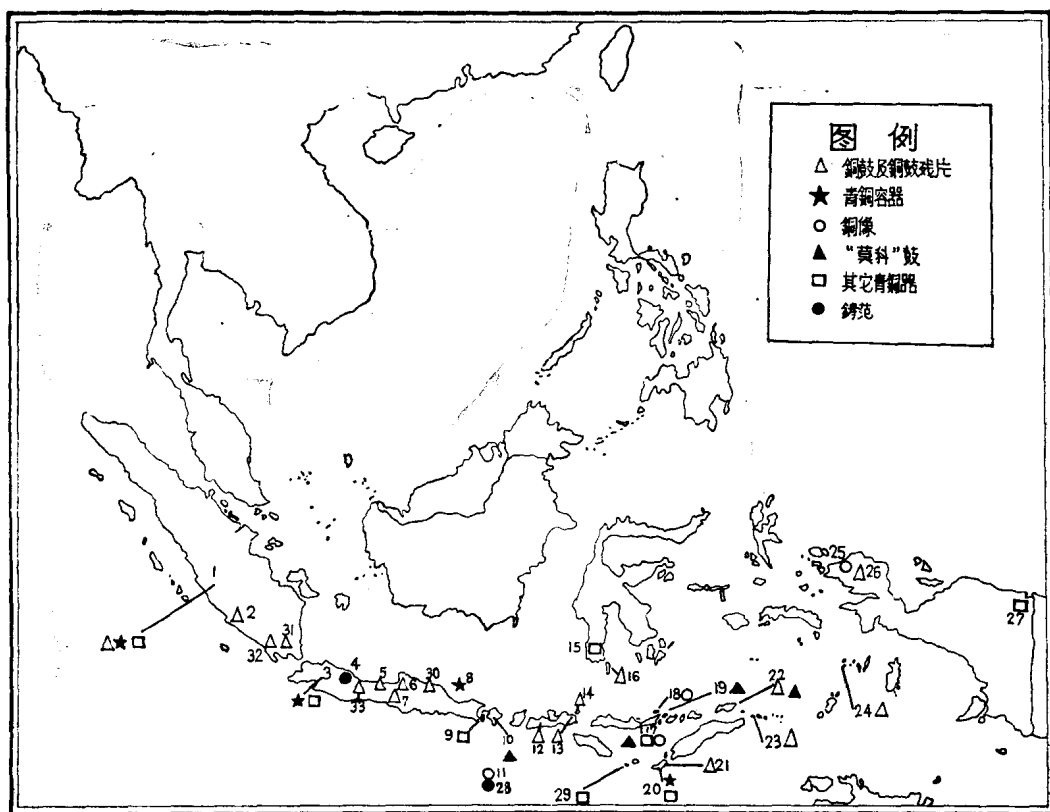
卡塞琳·林道夫: 美国匹兹堡大学艺术系教授, 东亚考古学家。

公元一千年间东南亚的早期历史，成了1973年在伦敦亚非学院召开的那次重要学术讨论会的中心议题（Smith and Watson, 1979）。东西方学者的主要关注点是，是否应将东南亚看作来自世界上其他邻近地区的文化影响的交汇点；或是东亚文化向南扩展，或是印度和西方文化向东扩展。会议主持者宣布的结果是对传统分析的挑战，而传统看法主张该地区仅是一个交汇点。会议建议把东南亚作为一个在它自身的史前史框架内独立发展的地区来进行研究。我便是在这一观念指导下开始研究的。

随着方法上的新进展，加上考古活动的增多及尤其包括在泰国、越南和中国在内的一些地区的发掘所采用的新方式，研究者已在重新考虑过去研究文化互动所采用的方法及其结论。他们试图通过证明与解释文化的稳定与变迁来回答展示在文化背景及其它原始记载中有关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甚或文化模式的问题，而不是以寻找诸如金属器物的纹饰和风格的分布地区作为基本目的。我的研究选择了印度尼西亚这样一个广阔而多样化的地区，考察根据的是新发现的材料和铜鼓发现的过程，并使用了早期的文字记载。它毕竟只是一个初步的研究，它在于提出问题和研究的新方向，而非提出一种特定的解释，它在于尝试并建议重新确定思考的方向。

今天使研究早期东南亚的学者们特别感兴趣的问题是围绕冶金术发展的文化变迁过程。用于分析西亚、东亚（尤其是华北）和中美洲的模式认为，上述地区的人类组织出现过重大的变化，其中包括国家组织、青铜器生产和社会分层等等。但正如乔伊斯·怀特最近所指出的那样（White, 1987），我们看待东南亚、尤其是她所研究的泰国时一定要带这一期望。怀特认为，青铜技术的发展是同当地的资源相适应的，是这一地区气候、地理和文化环境的反映。她指出，必须将东南亚金属使用的发展视为一种恰如其分的技术进步，即它针对其非都市化、以村社为基础所起的作用是恰如其分的。她进而指出，泰国的金属冶炼是一项本地的创新，金属物的使用和制造它的技术及方法都适合其社会背景（White, 1987: 15—18）。尽管不可能且不适合将印度尼西亚的冶金术视为其本地的创新，但要记住，应将这一技术和当地用此法生产出的器物看作是同该地区 and 某一特定地点的条件相适应的。

与泰国不一样，确定印度尼西亚金属时期编年的线索很少。铜鼓在研究印度化以前的印度尼西亚时处于中心位置。从很早时期，黑格尔 I 型铜鼓和一种当地称作“莫科”（moko）或“佩金”（Pejeng）型铜鼓的变体就均见诸报告了（Rumphius, 1704; Barchewitz, 1730）。铜鼓广泛分布于印度尼西亚。尽管它在南苏门答腊、爪哇和巴厘最为常见，但也有惊人数量的铜鼓和其它青铜器物发现于印度尼西亚东部的小岛和伊里安查亚（见图一）。索约诺在巴厘岛的马努阿巴找到了石范，根据他1969年的报告，现在可以说“莫科”鼓这种出自巴厘、阿洛尔岛和佛洛勒斯岛的有明显地方特征的类型就是在当地制造的（见图二）。其它的铜鼓，除一个外都属黑格尔 I 型，不易与东南亚大陆的同类标本相区别。所有这些标本过去从未得到考察，现在却正在考察它们以便决定制造它们的大概时间和可能地点。铜鼓、铜斧和某些装饰品的纹饰图案具有一些共同特点，如均饰有同心圆带纹、三角形纹、连续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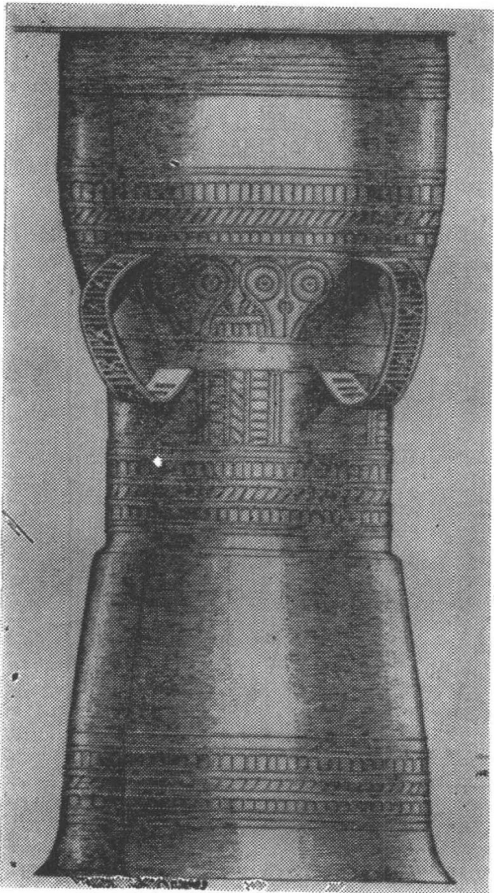


图一、印度尼西亚发现的青铜器的分布图 (L. Van Berkela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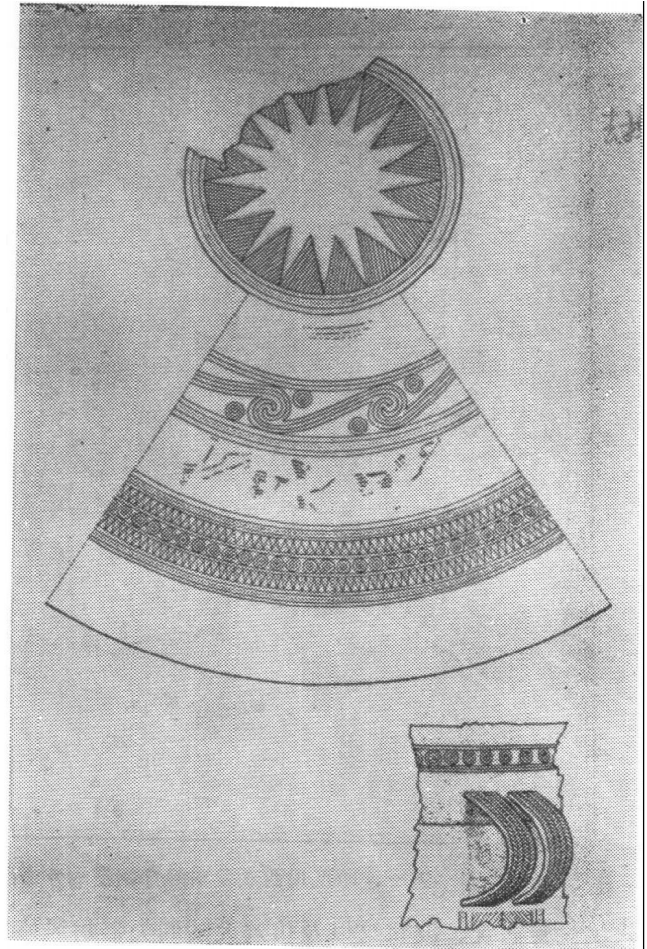
状纹、漩涡纹、波状纹以及仿效大陆同类器物风格的鸟状纹等(见图三)。部分器物还发现有人物、动物、船舶和村寨的图案(见图四)。广泛分布于小岛上的器物的发现,证明了整个群岛同东南亚大陆进行地区间相互贸易的观点(Glover, 1979: 1982—3)。

东山文化丛民族之间的交往接触,许多世纪以来一直被不同的学者记载下来,收藏家和考古学家对它们研究也达五十年之久。史载第一次在中国的这类交往是在中国皇帝与滇王国王室间,时间至少早到汉代(B.C206—220A.D)(Pirazzoli-t' Serstevens, 1974)。托勒密在其《地理学》(Claudius Ptolemy "Geographica" Book VII, 2)中认为产金的赫尔索尼斯位于马来半岛的南端,而卡得嘎拉港则当位于西贡和河内附近(Wheatley, 1966; Hudson, 1961)。至公元一世纪,罗马商人已开辟了通往伊洛瓦底江和萨尔温江南部港口的航道。这些港口通过商道同中国南方云南省的腹地相连。在同一时期,商人们也通过马六甲海峡航行到苏门答腊,并绕过马来半岛进入东京湾,以寻找丝绸之路。从云南经印度到大夏的商道也早在公元前二世纪就为司马迁所记载(《史记》, ch.116; Yu, 1967; Bleckman, 1972)。这些商道的位置和贸易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也可通过调查来搞清楚,并且这项工作有望在不远的将来按计划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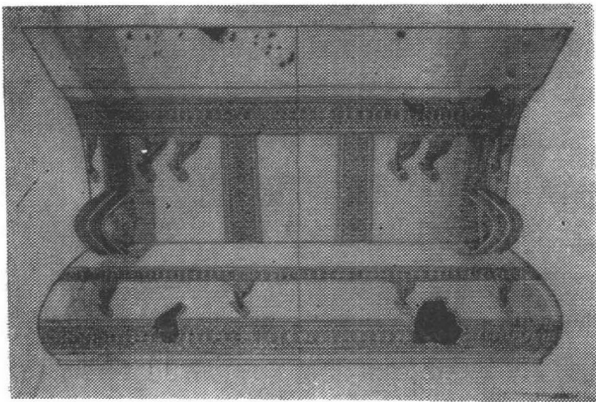
然而,贸易交往之路的古老程度过去未能精确地确定。通过新的发掘资料并尤其是中国



图二、早期“莫科”鼓藏于雅加达博物馆（采自kempers, 图版21.01）



图三、“莫科”鼓上的纹饰
此鼓发现于爪哇（采自kempers, 图版2.03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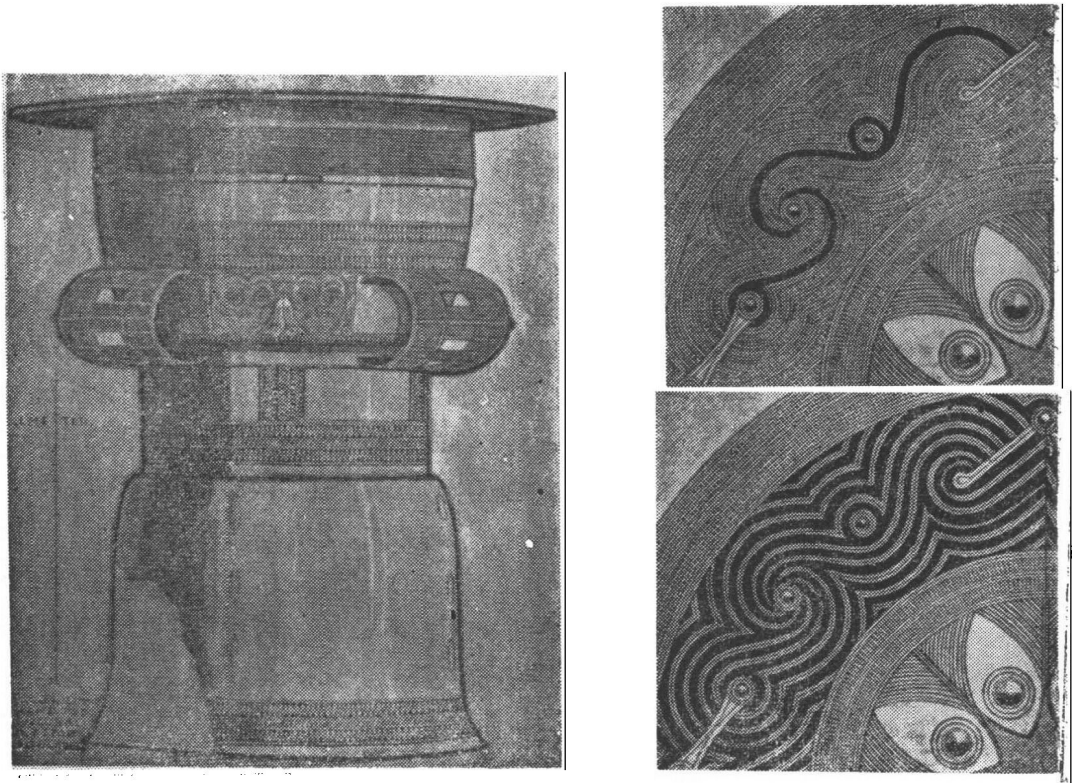
图四、1904年在西爪哇发现的铜鼓的纹饰墨线图
（采自kempers, 图版2.03b）

的出土物，对贸易交往的时代和地点均可加以证明(Bunker, 1972; Dewall, 1961; Pirazzoli-t' Serstevens, 1974)。比如，滇人与中亚游牧部落之间的交往被证明至少早到公元前七世纪（Peng, 1985）。云南与四川的居住遗址与墓葬的发掘可以解释本地的中国人与游牧民族的传统在华南这一地区发生了融合。通过该地区史前生活方式的了解，证明了这些早期部落集团间交往的方式与其历史的悠久以及它们同南方东山文化丛的关系。

直到最近，在印度尼西亚发现的金属器物中很少可确定其年代位置。即使目前缺乏碳14年代数据而令人遗憾，但某些时候则能从考古学的联系中找出了解它们久远年代的线索。例如1985年夏季在爪哇东北部巴拉望岸的发掘，从墓葬中出土了一面黑格尔 I 型铜鼓。这面鼓在一个包括有瓮棺葬的墓地中用作盛装死者骨骸的容器。还有另外两处的发现例外，一处是在桑格昂岛，一处是在阿洛尔岛，此外其它所有黑格尔鼓的发现地点均在地面(Bintarti, 1988)。

出土于巴拉望岸的标本特别使人感兴趣，因为它位于瓮棺葬之中。根据格洛弗(1979: 179—181)的报告，在印度尼西亚，包括瓮棺葬在内的七种主要葬式结构时间上属于公元前第一千年纪。这种墓葬相当广泛地分布在西爪哇和东爪哇、南苏门答腊、沙撈越、西巴厘、中苏拉威西、萨拉亚尔岛、松巴岛。D·D·宾达德于1988年夏刚在松巴岛发掘出一处新的遗址(Soejono, 1969: 84—5; Van Heekeren, 1958: 80—9)。这一墓葬类型大多限于海岸地区，并具有与处于早期金属时代的大陆其它海岸地区社会体相同的特征(Glover, 1979: 180)。印度尼西亚最著名的遗址是西巴厘的吉利马努克，本地制造的青铜器和铁器发现于那里的出土器物与葬式迥异的墓葬中(Soejono, 1979)。巴拉望岸的发现提供了铜鼓在古代存在的基本证据，该时代可能早到公元前第一千年纪，同时也使我们知道铜鼓既与死亡和丧葬有某种联系，也是社会地位的标志，具有用作葬具这一不同寻常的性质。

1982年在阿洛尔岛进行的另一次发掘资料，尚待发表(Bintarti, 1988)。在该岛的拉蒙岸发掘出了两面铜鼓，其中一面黑格尔 I 型鼓在上，它的下面是一面倒置的“佩金”鼓也即“莫科”鼓。“莫科”鼓主要发现于印度尼西亚东部地区，即巴厘、阿洛尔、阿多纳拉、佛洛勒斯和东爪哇的特定一处，它是黑格尔型铜鼓的一种当地变体。宾达德根据其纹饰区分出“莫科”鼓的四种类型(Bintarti, 1981 b: 67)。第一种类型的“莫科”鼓在鼓面上饰有八个突起的星纹和若干波浪纹、花蒂、圆环和其他几何图案。鼓的底面饰有房屋和鼻梁隆起、眼睛外凸、长耳垂上带有钱币形耳环的人脸图像，这使人联想到至今仍流行于加里曼丹岛妇女之中的达雅克人(the Dayak)习俗。鼓面纹饰的类似以及其带有双耳的延长的底部，表明它是在晚至公元五世纪华南还在生产的黑格尔 I 型鼓的基础上直接改进加工的。其它“莫科”鼓的年代明显较晚，因为根据宾达德的分类，类型 II 中的纹饰源于印度教画像，类型 III 中的纹饰源于荷兰人和英国人的图案和人物造型，类型 IV 中的纹饰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描绘的人物和动物图案(Bintarti, 1985: 67)。一面“莫科” I 型鼓直接埋在一面黑格尔 I 型鼓之下，它的发现表明两者在造形和纹饰上的密切相近和它们共同受到的顶礼膜拜。“莫科”鼓大概是从古代发展起来的，但直到今天它仍具有其重要性。“莫科” I 型鼓也称“佩金”型鼓，因为其最著名的样品藏于巴厘中部佩金地区的普拉·彭塔兰·萨锡神庙(月神庙)(见图五)。其状如沙漏，鼓体明显由整体铸造而成，鼓高约有180公分，由此可见它的铸造是一项十分艰难的任务。据巴厘人的传说，这面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现在它被作为与月亮有关的冥界力量之源泉来崇拜。“莫科”鼓在巴厘和阿多纳拉是神圣的，禁止人们触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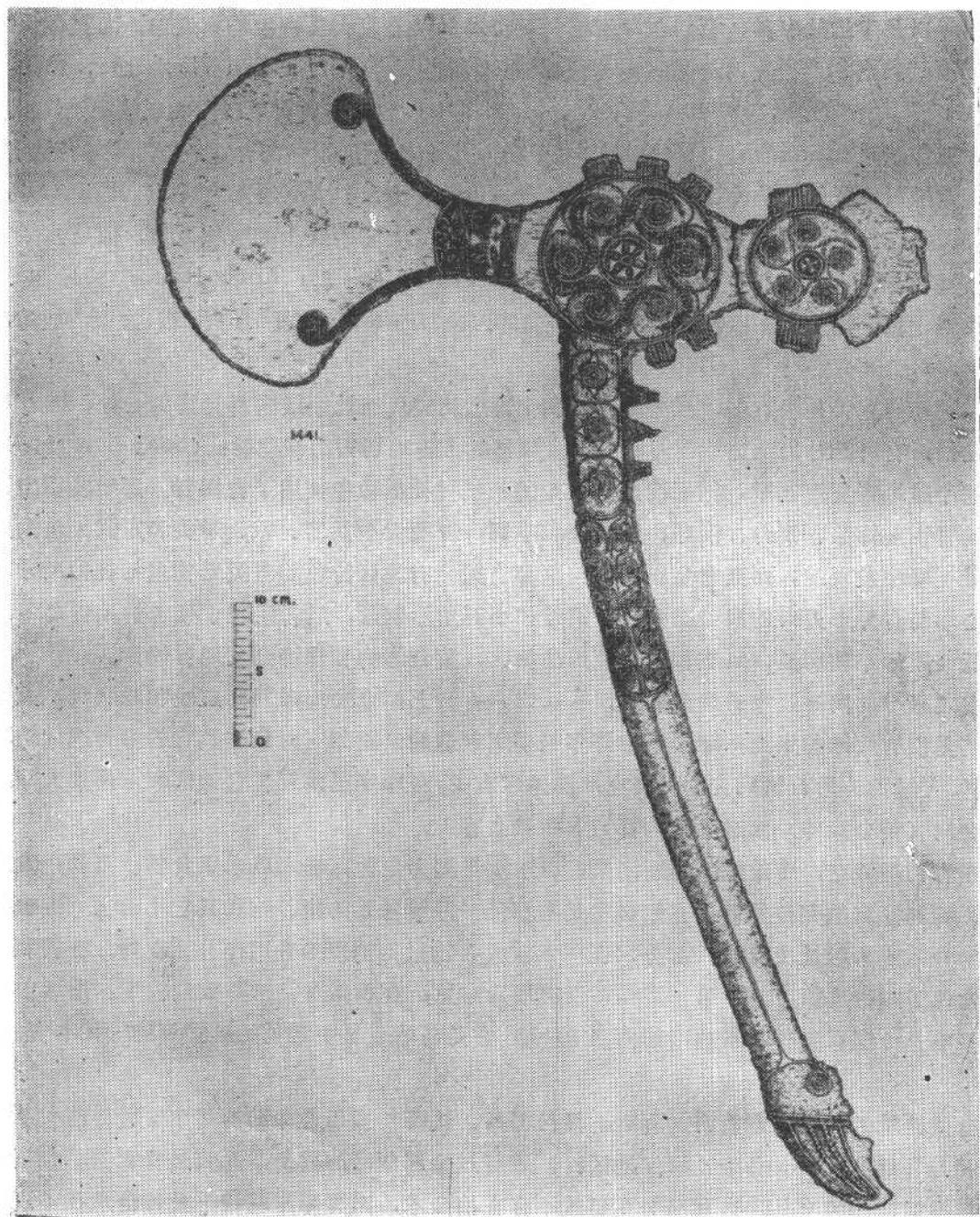
图五、巴厘的佩金“月亮”鼓（采自 Kempers, 图版3.07a）

“莫科”鼓在同一时期的其他用法也能够了解到。在图班、塞兰、波各尔诸岛发现的小型鼓的功能还无法准确弄清，但据说是用作殉葬品。在采集时，萨拉亚尔岛、桑格昂岛和阿洛尔岛发现的大鼓被用于祈雨仪式。如遇干旱季节，人们便将它们翻转过来敲击（Bintarti, 1985: 71）。在印度尼西亚东部地区如巴厘，“莫科”鼓在举行寺庙仪礼期间作为圣物被经常放在台座或祭坛上。在阿多纳拉，“莫科”鼓被看作五谷丰登的象征，里面装着上天赐予的庄稼，在收获之前带给人们。隆巴达岛的“莫科”鼓被视为祖先的传家宝而被祭奉。在阿洛尔，“莫科”鼓又用作新娘的嫁妆，否则婚姻就会遭到厄运（Bintarti, 1985: 71）。

这些有关铜鼓使用的记载，表明了这些岛屿具有的一个重要特征。这就是那些同当时时期甚或更早时期的同一类型器物有关的信仰内容是随着本地的习俗而变化的。黑格尔类型鼓和“莫科”Ⅰ型鼓均与死亡、丰饶和超自然神力有关联，该看法能从最近频繁报告到考古调查中心的证据中得出。其中包括这么一个故事：报告人在梦中被告知铜鼓的埋藏地点，随后便在一确定地点挖出一面铜鼓。显然，一种尚未采用的研究方法便是逐岛考察涉及到使用和制造铜鼓的传统信仰。而且可以肯定，它们的持续使用表明了其重要性得助于人们的崇拜，即或发生过一定变化。况且肯定，青铜作为适合于制作这些神物的材料被继续使用，以及更早的青铜器物的保存，皆能通过了解较近几个世纪以来穆斯林传统中对金属的崇拜而得到部

分解释。所有这些类型的铜鼓在地面保存了许多世纪，说明它们在礼仪关系中有着持续不断的生命力。探索与铜鼓有关的信仰和用途，是一个尚待开展的令人兴奋的课题。

从上述记述中，似乎可以认为黑格尔型铜鼓从传入之始就受到了特殊对待。引进这些



图六. 东印度尼西亚洛得岛的礼仪型钺
(采自kempers, 图版22, 18)

“外来的青铜器种类”的社会体可能当时早已知道了铜鼓并已在使用它们，但他们所制造的青铜器物并不为人所知或是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使用。要弄清这一问题，有必要观察一下确信为古代制造的其它青铜器物（见附录 I）。发现最多的金属器物种类是铸范、有銎青铜矛、铜斧以及少量的农具，它们在印度尼西亚群岛的所有较大岛群中均有发现，而且在从爪哇、巴厘到阿洛尔的南苏门答腊和南苏拉威西群岛中最为常见（Van Heekeren, 1958: fig.1）。索约诺鉴定出八种类型的铜斧（1971），其中包括仅在限定地区内发现的类型，如洛得岛斧或称爪哇“Chandrasas”仪杖钺⁽¹⁾（见图六）。若干不同类型的存在表明了它的地区性变化，这足以反驳任何认为这些工具是通过贸易从大陆输入印度尼西亚的观点（Bintarti, 1985: 67和1981:1—14）。许多铜斧上的装饰显然源于大陆铜鼓上的图纹原型，但足够多的铸范的发现却能证明它们是在本地制造的（Hoop, 1932: 88—89; Rothpletz, 1951: pl. XI, 发现于班东附近；在沙班，Harrison, 1966: 175—6, pl. III b.; 在塔兰得列岛，Bellwood, 1974: 6; Soejono, 1964）。

吉利马努克仍是最有名、报道最详细和全部金属时代遗址中最容易弄清的一处，随着对它的发掘，有可能对出土这些铜斧和其它金属器的考古现场得出某些看法（Soejono, 1979）。尽管这个遗址未发现铜鼓，但很清楚，该地的一些村社活动中使用了青铜器。那里发掘出了大量的青铜装饰品、铜铃、铜环、铜佩饰和手镯，以及大型兵器、戟、矛头和短剑。鱼钩是在居址瓦砾中发现的，而其它金属器则与墓葬有关。有地区特色的各类器物包括各种尺寸的带有心形与月牙形刃口的典型巴厘式青铜斧和小五角形铜盘，后者发现于死者的颅骨之下。与广泛使用的小玻璃质、贝质和石质装饰品相比，黄金饰物和珠饰则发现得较少。

发现最多的陶罐经过研磨并印有网状纹饰，有些上面也发现雕刻的直线和波状纹，其他还有些是没有纹饰的素面陶罐。其中许多是手工制造的。正如同众多其它的沿海遗址的联系那样，大量的方形石镑同吉利马努克周围地区有关。在印度尼西亚其它地区和东南亚大陆，不用金属（黄金除外）制造的器物都与农耕社会有关。

在吉利马努克，当地居民的经济基础以水生贝类为主食，辅之以采集食物。墓葬也发现有猪、狗和家禽的完整骨骸，它们必定是殉葬品。散置各处的猪、狗和其它小动物（蝙蝠与鼠）的骨骸成为居址废墟的一部分，证明了较大动物已得到驯养并用作补充食物。在吉利马努克发现了四种墓葬，其中第一类和第二类最为常见，合葬墓与瓮棺葬数量较少。遗址中仅发现了唯一一座双罐葬，索约诺相信（1979）它是岛屿遗址中常见的贮罐葬的一种本地变体。

对该遗址的大体观察表明，陶罐、简易工具、铁器和某几种珠饰都是在聚居村落中制作的。并与邻近的社会（岛屿？海岸地区？）进行过金属制品的贸易，尤其是青铜器、金器和某些种类的珠饰的交易。吉利马努克显然不存在冶金术，因为那里既找不到铸范又找不到铸

(1) Soejono, 1971, 分别为Ⅷ型和Ⅷ型。

件。在巴厘内陆地区不仅发现青铜斧，也发现了铜鼓和石质斧范，这证实了这里的冶金业曾处于发达阶段（Soejono, 1979: 197—8）。对金属制品尤其是青铜器的特殊珍视，这从它们在吉利马努克主要作为殉葬品和交易物资中可得到证实。双罐葬的罕见与墓葬物品的不同亦表明，村社社会结构中内部已出现某种差别。

人们对此必然要问，青铜在吉利马努克和其它类似社会体中究竟起有什么作用？目前从整个印度尼西亚群岛得到的证据都不能表明青铜器的广泛使用和生产，仅丧葬方面的功能除外。生产工具如矛头是用铁来镶刃或完全用铁制造的。所产青铜器的种类包括各种装饰死者的物品，诸如手镯、足环、耳环和根据用于劈砍的实用型斧铤演变而来的礼仪斧。劈砍活动常用于清理森林和加工木料，并且雕刻木头肯定如今天一样在这些社会中是一项复杂精细的手艺。G. E. 朗姆菲乌斯于1704年对青铜斧作了首次记载，他为每件标本的发现地点和尺寸大小编目，并指出当地人相信这些斧子充满了魔力，尤其是在群岛的东部地区（Rumphius, 1705）。与作为一种史前时期原型的印度尼西亚普通型石铤相比，青铜器标本清楚显示出发达阶段的特征，水平超出了可预料的过渡形式（Soejono, 1972: 6）。这表明工匠们有过试验或借鉴，并表明青铜器或许引入这些岛屿的时间较晚。有趣的是，铁制工具受到的先前所用的石质工具和贝制工具的影响超过其所受青铜斧类的影响。与起礼仪作用的青铜器不同，这些铁制品标本均是生产工具（根据Glover的报告，1979: 184）。爪哇和巴厘是青铜斧分布最密集的地方，但最精细的标本则发现于东部地区。青铜文化的发达阶段曾对这些地区产生过显著的影响，尽管这种技术主要用于礼仪目的。它们造型种类繁多和纹饰风格各异，又一次证明了在本地进行的试验（Soejono, 1972: 7）。对各类工具进行研究，能够提供有关其分布和在本地用途的有用信息。

在如吉利马努克这样的社会体中，青铜器的使用是一个附带的过程，该过程并未严重地改变其社会、政治或经济组织。事实上，认为生产青铜器的社会会因知识的发展和技术的采用而从根本上被改变，这是值得怀疑的。岛屿构造，其所处热带气候和多变化的地形，都将不利于建成那种能控制矿产资源及广泛的政治网络的庞大生产中心。于是，技术便被采用并同岛屿的环境相适应，并明显地专用于礼仪活动。

热带的环境条件不利于具有高度自治化的特定文化系统的大规模发展。它们可以在一有限的局部范围内发展起特定系统，其代价是其社会经济过分依赖于其它集团。这些热带环境条件助长并维持了一种高度的多样性，尤其就生存方式及相关的社会——文化特征而言（Hutterer, 1976: 226）。这大略出现于全新世中期（公元前三千年）。当时，农业人口的分布在从印度尼西亚群岛至新几内亚。根据石斧类型的分布，大致的文化范围可以弄清楚，以至于我们能探明限于地区内部的贸易，该贸易将逐渐开始使大陆、邻近岛屿和海岸地区的各个区域并为一体。马来亚、苏门答腊、爪哇和巴厘便象小巽他群岛和摩奴加岛那样连接起来。在爪哇、巴厘和苏门答腊南部地区，优越的土地和气候条件带来了人口的增加和农业的发展（Glover, 1979: 183）。正是在这些岛屿上找到了大量各种类型的青铜器，并发现了仅有的

生产青铜器的证据。只有海洋才为海岸地区和小岛屿提供了扩张的机会，使外界感兴趣的高度流动的社会体得以发展，从而将内容相同的物质文化和艺术图饰传播到整个地区(Glover, 1979: 183) 而又不失掉其独有的本地特征。可以肯定，青铜技术正是在这些海岸地区最先引入并扎根的。在青铜技术传播之时，本土文化的固有传统被保存了下来。

海岸联系的建立与保持在整个印度尼西亚历史中明显可见。充分数量的青铜兵器的缺乏，表明引进该技术的动机是贸易交往而非殖民。恰与泰国的情况相同，金属虽具有重要用途，但却不是在军事方面。正好随着其后而来的印度化过程，贸易也必定成为印度尼西亚进入到金属时代的媒介。

上述观察使我们将注意力重新放在印度尼西亚群岛和它作为东山文化丛组成部分的问题之上。或许这一类考察的最有价值之贡献在于它充分掌握并提供了通过根据新发掘材料来重新思考过去著作而获得的资料，这并不多见。其结果便使作进一步调查的途径变得更为清晰。比如，使人感兴趣的问题涉及到青铜器、独特的印度尼西亚型“莫科”鼓、礼仪铲和斧形物(洛得岛、巴厘岛)在当地的制作和有关纹饰内容成分，如佩金“莫科”鼓上的T形纹和面具形式图案等(Soejono, 1964: 136—7, 141)。巴厘将被认为是详细研究“莫科”鼓的最佳地方。研究它的用途和其与东山类型鼓的关系目前正是时候。另一使人头痛的问题是金属器时代的编年。这一问题的解决将有待于科学研究所提出的资料，在这之前我们则需将宝贵的时间单纯用于收集所有的印度尼西亚黑格尔I型青铜鼓标本上，然后便能在充分所见资料的基础上得出的一参照系来与大陆铜鼓的原型进行比较。通过初步观察，就可注意到它们与东山类型完全相似，并且同晚些时候在中国东南部所发现的完全相同。它是否表明对这些器物的交换或贸易曾在一个长时间内时断时续地进行，该时期即从公元前最后一个世纪到晚至公元三~五世纪之间，当时正值印度的影响变得越来越大？发现于那些小岛屿上的铜鼓是否能被认为比爪哇铜鼓在时间上更晚？通过研究鼓的类型和纹饰能把这一问题弄清吗？象在比哇、松巴哇岛出土的那些独特的带象与孔雀图案的鼓是否另有来源？尚未谈到的另一问题是黑格尔型鼓与“莫科”鼓两者以及普通铜鼓在当地的重要性。在什么样的场合使用铜鼓？在不同的岛其用途肯定有所不同，而巴厘和阿洛尔是开始分析该情况的好地方。由于缺乏科学手段提供的资料，自然会出现严重的问题。但是，进一步的发掘与对资料的考察目前正在索约诺和宾达德的指导下进行。今天我们所做的不过是一系列既令人兴奋又富有挑战性的工作的开始。

(四川大学 石应平译 张力校)

附录 I：印度尼西亚的青铜器

(分布区从西向东)

岛屿	遗址编号	遗址名称	器物种类	资料出处
苏门答腊	1	克林季期	鼓膜残片 (1936)	Loewen stein 1956.

岛屿	遗址编号	遗址名称	器物种类	资料出处
				Hoop 1938
			臂章 1	Bellwood 1979
			壶 1	Bellwood 1979
	•	邦卡槟榔	小雕像 14	同上
			手镯、踝镯、装饰品	
	2	明古鲁	黑格尔 I 型鼓	Bintarti 1985, Van Heekeren 1958:21
	•	万丹人	铜鼓	Soejono 1969
	31	楠榜	铜鼓	Van Heekeren 1958:21
	32	班迪纳夏	残片	Van Heekeren 1958
西苏门答腊	•		(赤土铸范) 斧、 矛、环饰铸范	Soejono 1969
爪哇	3	勒维利昂	铜斧、铃 1	Bellwood 1979
	•	塔努尔约	碗 1	
			铜鼓 1	Van Heekeren 1958:18
	3	波各尔	环饰、手镯、垂饰	Bintarti 1985
	4	万隆北部	有釜器的铸范	Rothpletz 1951 等
	•	波各尔附近	小型鼓	Van Heekeren 1958:18
	20		celts	Loewenstein 1956
	5	北加浪岸	鼓膜	同上
	6	三宝垄	鼓膜等	Heger 1903:18 Loewenstein 1956
			铜鼓残片 2	Van Heekeren 1958:18
	7	韦莱里	黑格尔 IV 型鼓	Bintarti 1985
	•	万由马士	鼓膜残片	Loewenstein 1956
(西瓜哇)	•		红烧土的斧、矛、 环饰铸范	同上
	33	展玉	鼓	Van Heekeren 1958:18
(中爪哇)	•	迪延高地	鼓膜	Van Knisbergen 1865 和 Soejono 1969
	•		“莫科”鼓	Soejono 1969
(东爪哇)	•	拉蒙岸	黑格尔 I 型鼓 2	Bintarti 1985
	•		“莫科”鼓 1	同上
	•	蒙托瑞	黑格尔 I 型鼓 1	同上
	•	伦厄尔	黑格尔 I 型鼓 1	同上
			小雕像、斧	
	30	巴拉望岸	黑格尔 I 型鼓 1 (1985年发掘)	Bintarti 1988
马都拉	8	阿桑查兰	铜壶 1	Malleret 1951
巴厘	9	吉利马努克	钺、手镯、踝环 耳环、Sprials、 五角形铜盘、铁/铜短剑	Soejono 1979
	10	佩金	“莫科”鼓	Rumphius 1705与 Glover 1979
	11		祭祀品形状物	Glover 1979
	28	马努阿巴	“莫科”鼓石范	Soejono 1969
	•	努沙登加拉	钺	Bintarti 1985
松巴哇	12	西冷	黑格尔 I 型鼓	同上
	13	比马	葡萄牙(?)鼓	Sukarto 1973
桑格昂	14		铜鼓 6	Kortleven 1937